

论比较经学作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展开途径^①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教授,100872 北京,中国)

提要: 针对在汉语学术界中开展的圣经研究必须要面对的“多元经典”处境,本文提出以“比较经学”作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可能途径。通过对圣经研究学术史的考察,本文认为多元宗教、多元经典之间的比较经学实际上一直构成圣经研究的潜在方法。而所谓“文本辩读”与“经典辩读”,其方法设假设、理念及操作方式,也可视为一种比较经学的前身。在圣经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借鉴“经典辩读”或“跨文本诠释”等当代圣经诠释理论,本文尝试对比较经学做出一个定义,并对它可能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针对汉语语境下的圣经研究的特殊处境,本文认为比较经学可谓是一种介于比较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圣经诠释方法,具有与当代比较神学类似的性质。

关键词: 比较经学、汉语基督教经学、经典辩读、跨文本诠释学

作者: 游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副院长,电子邮箱: Youbin99@sohu.com

人们普遍意识到,在汉语处境中开展基督教神学或《圣经》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多元宗教经典是汉语文化处境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与基督教进入中古欧洲、美洲乃至非洲的情形很不相同,在上述地区,基督教也许同样面临着本土多元宗教的处境,但基督教作为“有经之教”、基督徒作为“有经之人”,与主要以口传传统(oral traditions)作为文明载体的本土宗教有着相当差异,文字与经典甚至是使这些地区迅速基督教化的重要推动力。^② 但在中国文化处境中,无论是儒教、佛教还是道教,自身都发展出悠久的经学传统。如何面对这些多元宗教的经学传统,是汉语处境中的《圣经》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①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09JJD730002)基金资助,首发于《道风》*Daofeng* (34期,2011年1月),经授权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按:本刊原则上只发首发文章,因该文切合中西国学之题旨,故在此特别刊出。)

^② 具体例子可参游斌 You Bin,《圣经翻译、文字创制与社会转型: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接受为例》*Shengjing fanyi, wenzi chuangzhi yu shenhui zhuanxing: Yi Zhongguo xinan shaoshu minzu de Shengjing jieshou wei li* [Bible Translation, the Creation of Writing System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Paradigms: Taking the Acceptance of Bible in Chinese South-Western Minor Ethnic Areas as an Example],《基督教思想评论》*Jidujiao sixiang pinglun* [Reviews on Christian Thought],(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286-298。

本文试图提出“比较经学”的概念,以回应汉语语境下的基督教经学(即汉语基督教经学)与中国本土宗教的经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③ 本文认为比较经学是汉语基督教经学之开展的重要途径。它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比较经学的含义是什么?它在《圣经》研究学术史有什么渊源?其次,在人文学与神学之间,比较经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位置?换句话说,比较经学分别具有怎样的人文学与神学意义?最后,比较经学具有什么样的宗旨与研究方法?可以对其做出一个怎样的暂用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呢?

一、比较经学的学术史渊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经学是现代《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诞生以来人们研究《圣经》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使人们不再将《圣经》理解为“神启文本”,而是记载古代以色列和早期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宗教经验的作品,因此,可以用历史学或宗教学的方法对《圣经》展开研究。这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圣经》,即它是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内的信仰群体的宗教经验,《圣经》文本可以被拆分为不同的信仰传统。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观之,可见它们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处境,神学倾向或信仰表达皆有不同。

在旧约研究领域,这一比较研究得出最著名的理论即“五经四源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它的方法论假设就是:《圣经》文本对于上帝性质、神人交往方式、摩西与亚伦的角色等进行叙事时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以色列的不同神学传统对于耶和华信仰的不同理解。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可以将它们归纳为J、E、D、P等四个大传统,其中J是属于南国犹大的,它所理解的上帝是人格化的,以拟人的方式与人相交,展现出上帝慈爱、恩典的方面,摩西的角度是被矮化的;而E传统则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它所理解的上帝是威严的,以隐秘的方式与人相交,展现出上帝的公正的一面,摩西的角色被突出出来;而D则强调在耶路撒冷的集中崇拜,摩西被呈现为律法的解释者等;P则强调亚伦的祭司角色,并以祭祀作为神人相交的重要途径。^④ 显然,它的方法论就是对《圣经》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突出《圣经》叙事的细微差

^③ 关于“汉语基督教经学”的概念,参游斌 You Bin,《走向汉语学术的基督教经学》Zouxiang hanyu xueshu de jidujiao jingxue【Towards Sino-Christian Academic Biblical Studies】,《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Logos & Pneuma】,No. 31,(香港 Xianggang: 2009),43-64。

^④ 参 Julius Wellhausen,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Edinburgh: A. and C. Black, 1885, 再版于 Gloucester: Peter Smith, 1973), 并参 Richard E. Friedman, *Who wrote the Bibl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7), 对该理论的应用与评述。

异,从而将古代以色列信仰分解为多元的宗教传统。^⑤可以把这一进路称为“原始的比较经学”(Proto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因为它看来,《圣经》内部的多元文本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同信仰群体的权威文本即“经”。在新约研究领域,人们同样以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新约文本,将早期基督教分解成不同的信仰群体,甚至对四福音书开展比较研究,可以还原出每一部福音书后的信仰群体。

之所以把上述研究称为“原始的比较经学”,是因为它虽然采取了比较的视角,但 JEDP 各传统仍然可视为一个耶和华信仰的不同层面,早期基督教各群体也都认信基督为救主,属于同一个宗教传统。然而,当人们对古代近东世界(Ancient Near East)与希罗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后,将《圣经》当作古代宗教群体的多元经典中的一员,进而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圣经》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在此意义上,《圣经》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经学了。例如,在旧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巴比伦、赫梯、埃及、亚述、苏美尔与以色列文化和宗教一样,既各有特色,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古代近东文化的某些普遍内容。最初人们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是为了寻找古代以色列信仰与这些近东宗教文化之间的同或异,如吉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与《创世记》的“大洪水与挪亚”之比较、埃努玛—埃利什史诗(Enuma Elish)与《圣经》创世叙事的比较、撒尔贡王的神话与摩西河上漂流的叙事比较、伊玛城(Emar)发掘的古代祭祀文本与《利未记》的祭祀法典的比较等等。事实上,不仅相似的主题或思想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写作的文体(*genre*)也被加以比较,例如家谱叙事、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法律文书是旧约和古代近东文化都普遍使用的文体,那么,一方面,对这些文体在古代近东文化中的作用及功能的了解,显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旧约的类似文体的意义;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比较旧约在使用同样的古代近东文体时,又使其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注入什么新的因素。

由于这些比较研究已经跨出了古代以色列信仰或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之外,带有跨宗教的文本(经典)比较的内涵,因此,这些比较研究已经呈现出“介入比较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内在困境。^⑥对那些批判学者(*critical scholars*)来说,在异文化中找到了《圣经》文本的对应物,甚至从写作时间断定它们为《圣经》的文本源头,这有力地挑战了《圣经》是上帝的“独特启示”的神学信念。犹太—基督教只不过是诸宗教的

^⑤ 这一进路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新文学批判法(*New Literary Criticism*)就认为,不能把《圣经》叙事的某些细微差异扩大化,将它们理解为不同的信仰传统,其实质也是反对历史批判法的比较研究这一方法论假设。参 J. Cheryl Exum & David J. A. Clines eds., *The New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Hebrew Bible*, (Sheffield: JSOT, 1993)。

^⑥ 类似困境亦见于介于“比较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比较神学”,对此评述可参赖品超 Lai Pinchao:《比较神学与汉语神学》*Bijiao shenxue yu hanyu shenxue*【*Comparative Theology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Logos & Pneuma*】, No. 25, (香港 Xianggang: 2006), 147-164。

一支,犹太—基督教《圣经》不是神圣启示,而是人造作品,是巴比伦或埃及“圣经”的派生或翻版而已。^⑦而对有信仰背景的学者而言,比较研究亦可用来证明基督教的传统认信(confessional)立场。人们或者通过把《圣经》文本与同时代的经外文献相比较,从而推断《圣经》文本的历史真实性,进而确认“上帝启示是基于信仰群体的真实历史经验”的神学信念。^⑧或者用比较研究来指出以色列神学的独特性,即虽然《圣经》的某些文本取自其他的宗教经典,但在它们进入《圣经》的总体结构后,获得了全新的信仰意义,被《圣经》作者改编成独特的信仰叙事。

当然,由于上述研究多数探讨《圣经》形成过程中与古代近东文化的关系,此时“经”尤其是“封闭的正典”(a closed canon)的概念尚未形成,因此,此类研究很难严格地被称为“比较经学”。但它们已经是在多元宗教、雏型经典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其理路及操作原则对汉语基督教经学与中国宗教经典之间的比较经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简述如下:

1. 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似与相异都必须加以考虑;
2. 相似之处可能表示共同的文化遗产、知识环境或人类心灵结构;
3. 人们经常会发现表面的相似,但在概念层次的相异;或者相反,发现表面的相异,但在概念层次上的相同;
4. 在进行跨文化比较之前,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必须尽可能地在它们自身的处境中加以理解;
5. 不仅要考虑文本内容,还要考虑文本采用的文体(*genres*);
6. 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文体可能扮演的功能是相当的;
7. 当某些文化因素被借用时,它们可能会被那些借用它们的人改变为某种很不一样的东西;
8. 一个文化很少是单一性的(monolithic),不管是就其同时代不同部分的差异,还是考虑其时代变迁的差异而言。^⑨

综上所述,自现代《圣经》批评学产生以来,比较宗教或文化就是《圣经》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它隐含了两个基本前提:一、多元宗教或多元文化的背景;古代以色列或早期基督教信仰被理解为多元宗教中的一支,而非如前批判时期简单地将

^⑦ 参 M. W. Chavalas, "Assyri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A Century of Tension," in M. W. Chavalss and K. L. Younger Jr. eds., *Mesopotamia and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2002), 21-67.

^⑧ 它以正切合《圣经》年表为这些文本所设定的历史阶段的方式,表明《圣经》文本的真实历史性。例如, K. Kitchen 通过将旧约的立约文本与古赫梯的条约之间的比较研究,证明它们反映的是公元前二千纪中期,而不是如批判学者们所认为的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宗教和文化处境。详参 K. Kitchen,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⑨ 参 John H. Walton, *Ancient Near Eastern Thought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troducing the Conceptual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2006), 26-27.

非犹太—基督教传统斥为“异邦主义”(paganism)。二、其他宗教传统可以成为人们反思或理解基督徒信仰的一种资源。因此,随着宗教多元主义的格局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显著,在基督教传统内部,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宗教或比较神学的眼光来构建神学。^⑩ 表现在基督教经学的领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经典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的潮流。

经典辩读这一名词源于一个犹太名词“文本辩读”(textual reasoning),它是由一群犹太神学家和《圣经》文本学者发起的运动。《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的根基,但在近代启蒙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击下,《圣经》上的一切都似乎需要接受理性或历史的审判。于是,犹太教知识阶层便发出这样的疑问:

现代“怀疑的解释学”是不是穷尽了犹太教宗教文本的内涵?在学术怀疑与批判的利刃划过之后,文本还留下了什么?文本与今天的解释者群体之间还有相关性吗?^⑪

在他们看来,《圣经》是一部“意义盈余”的经书,即使是最精细的批判研究也不能穷尽它。因此,他们提出“文本辩读”的概念,即一方面它是基于《圣经》文本的,另一方面,它认为文本前面坐着的不是“怀疑者”,而是“辩读者”(reasoner)。这些经文的辩读者就是希望从宗教经文中寻溯到一层与当下信仰群体相关的意义,用利科的话说,就是追求一种“寻溯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retrieval)。

文本辩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后批判的”或者说“后自由的”犹太经学。为达到这一点,他们将现代的哲学与神学延请到对犹太经文的解读之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如科恩(Hermann Cohen)和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的犹太现代神学、林贝克(G. Lindbeck)的文化—语言模式(cultural-linguistic model)、格尔茨(C. Geertz)的文化理论或皮尔斯(C. S. Pierce)的语义学理论等。因此,文本辩读这一运动的最初动力就来自于将《圣经》经文开放于多样的人文思潮之中,借助于一种现代“辩读”来重新理解犹太教的经典与传统。这正反映在它的名字上,一者是犹太教文本,另一者是“辩读”(reasoning)即理智的力量。

但在一个多元宗教的世界里,仅仅在某一个宗教的文本与现代人文思潮之间的

^⑩ 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如 Francis Clooney, *Theology After Vedanta: An Experiment in Comparative Theology*, (Albany: SUNY, 1993); Keith Ward, *Religion and Reve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James L. Fredericks, *Faith Among Faiths: Christian Theology and Non-Christian Religion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9)。对他们的综合评议,参赖品超 Lai Pinchao《比较神学与汉语神学》Bijiao shenxue yu hanyu shenxue【Comparative Theology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一文。

^⑪ Steven Kepnes, “Introducing the Journal of Textual Reasoning: Rereading Judaism after Modernity”, *The Journal of Textual Reasoning*, (vol. 1, no. 1). <http://etext.lib.virginia.edu/journals/tr/volume1/kepnesTR1.html>, 2009年12月30日登入。

互动显然不够,多元宗教经典与传统之间如何相互借鉴,彼此深化,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西方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学者们一起再将“文本辩读”运动拓展为“经典辩读”运动。^⑫ 它深刻地体现了跨宗教、经典比较的精神,不仅参加者来自于不同宗教,而且人们所辩读的经文也选自不同的宗教经典。它的意图是使参与者超越所谓的“批判性”阅读,使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宗教传统中,并在对一段经文、一个形象或一个伦理主张的讨论中,既相互理解,又更深地反思并重构自己的信仰。可以这样概括“经典辩读”的几个主要方面:

1. 经典辩读是多元的“他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真诚沟通的活动。在对话中,每一宗教传统都被真诚地对待,是被尊重的“另一个”;
2. 经典辩读既是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也是它们共同与现代人文学术的对话,人们在对传统经文的重读走向一种“后批判”或“后自由”的神学;
3. 经典辩读也试图回应当下信仰群体所共同面对的当代问题,从而使经文具有当代相关性(relevance);
4. 在经典辩读中,没有任何人或群体独自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
5. 经典辩读要为未来提供一种新鲜的、经过检验的智慧,要从文本的研读中涉及更多的理论问题、哲学问题、神学问题或公共问题;
6. 所有的宗教传统不仅需要回到自己的经典和传统,也需要借助于其他传统对自己形成更好的理解和反思;
7. 经典辩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邻居的其他宗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最终在寻求智慧的活动中凸显高于对话之任何一方的绝对的“他者”;
8. 经典辩读的实践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自我反省,包含着对于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先在的确定性”(pre-assurance)之消解。^⑬

可见,经典辩读虽然阅读的是某一宗教传统的权威文本,但其目的却不是劝化阅读者,而是借用其他宗教的比较视角或资源来深化对自己信仰的理解。它是一种“信仰间的对话”,是为了深化彼此的理解,但它更是以信仰对话的方式来寻找“智慧”,强调经典辩读过程对于参与者的“转型”(transformative)作用,追求与“终极实在”的相遇。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人文科学;而就后者而言,则是一种神学。它是一个介于人文学与神学之间的运动。

^⑫ 其代表人物如犹太学者 Peter Ochs, 基督教学者 David F. Ford, 圣公会神学家 Daniel W. Hardy 等。2007 年后,一些伊斯兰权威也鼓励穆斯林参与这一运动。

^⑬ 杨慧林对“经典辩读”的内在精神的分析参杨慧林 Yang Huilin,《“经典辩读”的价值命意与“公共领域”的神学研究》,Jingdian biandu de jiazhi mingyi yu gonggong lingyu de shenxue yanjiu【The Value Meaning of Classical Reading and the Theological Research in Public Space】,《长江学术》Changjiang xueshu【Changjiang Academy】, No. 1, (2009), 51-52。

二、比较经学与汉语基督教经学

如上所述,经典辩读运动的实质是一种比较经学。但在目前,其参与者、所辩读经文都局限于亚伯拉罕系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它们在信仰上有着很强的亲缘关系。也就是说,“经典辩读”虽然将重心落在对“他者”传统的倾听与开放,但实际上受制于西方的宗教现实,参与者的“他者性”并不显著。在此意义上,将经典辩读的精神引入到汉语语境下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之中,不仅对某些权威经典的文本进行辩读,而且在两大经学传统之间进行比较性对话,使之成为一种全面的“比较经学”(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将提升对话参与者的“他者性”,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开放与反思自身。

在基督教权威经典——《圣经》与中国宗教的本土经典之间进行交互式阅读的必要性,已被那些具有本土意识的神学家们所注意,^⑭李焯昌提出的“跨文本阅读”(cross-textual reading)就是其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典可以称为“文本 A”(Asian text),而《圣经》经文可称为“文本 B”(Biblical text)。在汉语语境下的《圣经》解释就是在这两个文本之间的互读,即“人们能够按另一文本的方式来阅读某一文本,从一个跨越到另一个,以把握两个文本的精义。……通过这样的努力,就可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创造性整合或丰富彼此内涵的转化”。^⑮在他看来,跨文

^⑭ 韩国的 Tai il Wang 就提出,亚洲的经典传统有助于基督教《圣经》研究“回到正典”。参 Return to Canon: Korean Perspectives on Performing the Scripture, paper presented on *Mapping and Engaging the Bible in Asian Cultures*, (SABS 2008 Conference Handbook), 51-62.

^⑮ 李焯昌 Li Chichang,《跨文本阅读策略:明末中国基督徒著作研究》*Kuawenben yuedu celue: Mingmo Zhongguo jidutu zhuzuo yanjiu*【*The Strategy of Readings in Chinese Christian Writings*】,《基督教文化学刊》*Jidujiao wenhua xuekan*【*Journal of Christian Culture*】,No. 10,(北京 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The Pres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03),168。对“跨文本阅读”的总体说明,参李焯昌 Li Chichang 编,《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Yazhou chujing yu Shengjing quanshi*【*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sian Religions*】,(香港 Xianggang: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Jidujiao wenyi chubanshe【*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1996。具体个案研究,参李焯昌 Li Chichang:“The Chinese Creation Myth of Nu Kua and the Biblical Narrative in Gen. 1-11”(《中国的女媧创世神话与〈创世记〉1-11章》*Zhongguo de Nuwa chuanshi shenhua yu Chuangshiji 1-11 zhang*【*The Chinese Creation Myth of Nu Kua and the Biblical Narrative in Gen. 1-11*】),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No. 2,(1994),312-324;“Death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Divine in Zhuangzi and Koheleth”(《庄子与传道书中的死亡与感知神圣》*Zhuangzi yu Chuandaoshu zhong de siwang yu ganzhi shensheng*),《景风》(*Ching Feng*),No. 38,(Hong Kong:1995),68-81;“Exile and Return in the perspective of 1997”(《1997 的流放与回归: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圣经解释》*1997 de liufang yu huigui: Cong quanqiu hua de jiaodu kan Shengjing jieshi*【*Exile and Return in the perspective of 1997*】),in *Reading from This Place: Social Location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ed. Fernando F. Segovia and Mary Ann Tolbert,(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97-108;《论福音与文化中的跨文本解释学》*Lun fuyin yu wenhua zhong de kuawenben jieshi xue*【*Cross Textual Hermeneutics on Gospel and Culture*】,*Asia Journal of Theology*,No. 10,(1996),38-48;“Syncret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Biblical Tradition”(《从中国宗教与圣经传统的角度看融合主义》*Cong Zhongguo zongjiao yu Shengjing chuantong de jiaodu kan ronghe zhuyi*),*Ching Feng*,No. 39,(Hong Kong:1996),1-24;“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Bible and Female Principle(转下页注)

本阅读既是中国文化处境下进行富有成果的《圣经》解释的途径,也是历史上中国基督徒们的具体信仰实践。在对明末中国基督徒著作的研究中,他发现“两个文本在这些中国基督徒皈依的生命经验之处相遇”。^⑩

可以认为,李炽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跨文本阅读”方法,具有西方《圣经》学界的“文本辩读”乃至后来的“经典辩读”同样的意义。而他对于中国宗教经典作为基督教《圣经》的对话伙伴的“他者性”意识,也要优于西方的同行们。但是,对于汉语学术语境下的《圣经》研究来说,跨文本阅读仍然不足以完全把握《圣经》与中国经典处境之间的深刻互动。第一、跨文本阅读的中心在于“文本”(text)。但是,无论对于基督教或是中国宗教的经典而言,其文本必须在各自的经学传统当中才是活着的。光秃秃地将两个文本进行比较,难以真正地深入这两大宗教传统之中,对这两个文本的理解也难以深入、准确而全面。第二、跨文本阅读旨在以中国宗教的经典文本诠释《圣经》,从而使《圣经》文本在中国文化处境中更易于被理解或接收。就其学科属性而言,更似是《圣经》诠释(biblical hermeneutics)或者本土化神学(indigenization),较为局限于传统神学的范围之内。而在汉语学术语境之中展开的《圣经》研究,应该更具有人文学的维度,而不仅仅是《圣经》诠释的一支。

在此,笔者提出“比较经学”(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这一概念,以之作为汉语学术语境下基督教经学研究的开展方式。从内涵上讲,它承接《圣经》批判学以来用文化比较的视角理解或反思《圣经》文本的传统,借鉴当代“文本辩读”和“经典辩读”的学术旨趣,同时也吸收“跨文本阅读”对于中国多元宗教经典处境的深刻理解;从学术环境而言,则考虑到汉语基督教经学乃在中国大学建制内展开这一基本处境。而在更广义的当代神学潮流之内,它可以被称为“比较神学”的一支。以下对其内容、性质及内在张力做一简单论述。

作为世界文明中两个同样悠久的经学传统,基督教经学与中国各宗教传统(尤其是占据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儒教)之经学大致都可分为四个次级领域:一、本经学。它是对权威文本,如基督教之《圣经》,儒家之《十三经》等经典自身的研究。儒家与基督教在本经研究上的一些方法如音韵、版本、训诂等,可以进行相互比较与借鉴。

(接上页注) in Culture”(《女性主义释经及文化中的女性原则》Nuxing zhuyi shijing ji wenhua zhong de nuxing yuanze),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No. 10, (1996), 240-252; “the Recitation of the Past: A Cross-textual Reading of Ps. 78 and the Odes”(《对过去的诵读:〈诗篇〉87与〈诗经〉的跨文化阅读》Dui guoqu de songdu: Shipian 87 yu Shijing de kuawenhua yuedu), *Ching Feng*, No. 38, (1996), 173-200。

^⑩ 李炽昌 Li Chichang,《跨文本阅读策略:明末中国基督徒著作研究》*Kuawenben yuedu celue: Mingmo Zhongguo jidutu zhuzuo yanjiu*【The Strategy of Readings in Chinese Christian Writings】,《基督教文化学刊》*Jidujiao wenhua xuekan*【Journal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10, (北京 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The Pres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3), 169。

当代《圣经》研究较为成熟的一些方法如传统史方法(Tradition History)、新文学批判法、女性主义释经学、意识形态批判法,也可用儒家经典的研究有所启示。二、经学史。在近二千年的思想文化史发展过程中,《圣经》、儒家经典都与人类知识的其他领域如神哲学、文学等发生密切关系,并受到一般性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经学大师也都是思想文化史的重要人物。将这些经学史现象放在一起比较,将深化人们对彼此的理解。例如,在中国政治文化变化最为剧烈的宋代发生的疑经与尊经共存现象,^⑮与西方宗教改革前后人们的疑经与尊经,便是东西文明史上的两个有趣个案。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人们理解东西方宗教及经典的性质、尊经与疑经的辩证关系,便可以有很好的理解。三、经学诠释学。经学在东西方宗教中都是核心学问,人们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实践中发展出各种神哲学或社会政治思想,也形成了丰富的诠释学理论。对它们进行比较,对于构建中国式或基督教式的诠释学理论都将大有裨益。^⑯四、比较经学。如果我们以比较经学的概念反观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历史,实际上都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条隐约的比较经学的线路。在基督教历史上,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比较与互释,并非近代才出现的潮流,在两约时期、中世纪都已有呈现。而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者之间的激荡、比较与融合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流,而随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东传,中国基督徒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比较经学”实践。^⑰另外,虽然本文主要从基督教的本位,探讨中国经学传统之作为建构汉语基督教经学的资源的可能,但从中国经学的本位,看基督教的经学传统的可能贡献,亦是比较经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不可否认,就其本质而言,“比较经学”蕴含着介于人文学与神学之间的内在张力。首先,它可以是一般的人文学的一支,类似于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我们可以

^⑮ 参杨新勋 Yang Xinxun,《宋代疑经研究》*Songdai yijing yanjiu*【A Study on Doubtful Classics in Song Dynasty】,(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2007)。

^⑯ 关于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诠释学理论”的呼吁,可参其代表人物汤一介 Tang Yijie,《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Nengfou chuangjian Zhongguo de jieshixue*【Whether can Chinese Hermeneutics be Constructed?】，《学人》*Xueren*【Academic Scholars】，No. 13,(1998),6-9,及此后的一系列文章,《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Lun chuangjian Zhongguo jieshixue wenti*【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Hermeneutics】，《东海哲学研究集刊》*Donghai zhexue yanjiu jikan*【Tribune of Donghai Philosophical Research】，No. 8,(2001),7-23;《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Zailun chuangjian Zhongguo jieshixue wenti*【Re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Hermeneutics】，《中国社会科学》*Zhongguo shehui kexue*【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 1,(2000),83-90;《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Sanlun chuangjian Zhongguo jieshixue wenti*【The Third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Hermeneutics】，《中国文化研究》*Zhongguo wenhua yanjiu*【Study of Chinese Culture】，夏 Summer,(2000),16-20。

^⑰ 参李炽昌 Li Chichang,《跨文本阅读策略:明末中国基督徒著作研究》*Kuawenben yuedu celue: Mingmo Zhongguo jidutu zhuzuo yanjiu*【The Strategy of Readings in Chinese Christian Writings】。对于新教来华后的“比较经学”实践,可参李炽昌 Li Chichang 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Shenghaolunheng: Wan Qing Wanguogongbao jidujiao 'Shenghao lunzheng' wenxian huibian*【Discourses on Naming God: Debate on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Christian God in The Globe Magazine in Late Qing Dynasty】,(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Shanghai Guji Publications】，2008)。

对比较经学做一个人文学性质的定义：

比较经学并不仅仅是把某个经学传统与另一个进行比较,而是在研究某一个经学传统时,比较经学能够提供扩大研究者视野的方法——使他能够超越单一宗教的经学传统的界限,去考察不同宗教经学传统的潮流和运动,并认识经学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简而言之,比较经学可以解释为通过一个以上的经学视野来进行经典研究,并研究经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

在此意义上,人们为比较宗教学或比较文学设定的学术宗旨亦可适用于比较经学,诸如对异文化的了解、寻求与作为“他者”的宗教传统的应和、扩展不同宗教传统的精神世界并使参与比较的各方都能更深切地理解和反思自身等等。

但是,比较经学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神学”。也就是说,比较经学不只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宗教的经典传统,也不只是为了“跨信仰的对话”(interfaith dialogue),而是从其他宗教的经典传统中寻找有益于基督教经学的资源,进而推动当代神学与经学互动,提升基督教对现代问题回应的能力。它的目的是做基督教的经(神)学,只不过是以前比较经学即与中国宗教经典传统相比较的方式去建构基督教知识系统。它既是植根于基督教传统,又是服务于该传统的。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当今的“比较神学”潮流相当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对比较经学做一个神学性质的定义：

比较经学尝试通过其他宗教经典传统的资源来探讨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它出入于基督教经学与另一种经典传统,一方面对基督教有一定的委身,另一方面又真诚地投入到另一个宗教的经典传统之中。但其目的是学习另一宗教的经典传统,并以此来发现、重建或加强基督教理解《圣经》、基于《圣经》建构神学的能力。

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基督教的”比较经学,其比较的立场与目的是为了地地建立一套汉语的“基督教经学”。

可见,比较经学是一个介于人文学与神学之间的学科。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比较宗教学或信仰对话,是“比着讲”;就后者而言,它又是深化某一特定传统的信仰理解,是一种神学(theological reasoning),是“接着讲”。它一个居间的学术实践,并不试图去消解它自身的内在张力。既远离宣教式的释经学,也不同于单纯的《圣经》批判学,它首先是一个多元化的学科,致力于与其他宗教的经典传统进行对话;其次它是一个自我批判的学科,以其他宗教的经学传统为参照,不断地检审自己的学术渊源;

最后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准备接受其他有益的经学传统,甚至修正或转化自己的信仰体系。

English Titl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YOU Bin

Ph. 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 Vice-Dean,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Beijing, China

Email: Youbin99@sohu.com

Abstract: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multi-scriptural context of the Chinese Biblical studies,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th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as the approach of doing Biblical studies in 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ab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Biblical studie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approach has always been a methodology in the Biblical studies. Some contemporar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like “textual reasoning”,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since they agree in the method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ideas and even practices. This paper tries to reach a working definition for th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and then analyze its working areas. Regarding to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the Chinese biblical stud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is a discipline in-between humanity and theology, somehow similar to the nature of comparative theology. Finally, this paper takes an exemplary study of comparative scriptural reading with Zhu Xi’s Confucian scriptural reading strategy, especially his approaches to the questions of “what is the scripture?”, “why to read the scripture?”, and “how to read the scriptur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onfucian answ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no-Christian Scriptural hermeneutics.

Key words: comparative scriptural studies, Sino-Christian scriptural studies, scriptural reasoning, 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